



【转型论衡】  
成立政府投资公司不难，甚至依葫芦画瓢地学习淡马锡的治理结构也不难，难在模式的有效性上。

## 我国国企改革钟情淡马锡模式什么

许岩

最近，有关国企改革顶层设计即将出台再次成为舆论焦点。当前流传最多的猜测是，我国将以新加坡淡马锡模式为蓝本对国企进行改革，于是对淡马锡模式的关注再次升温。所谓淡马锡模式，就是政府——淡马锡——企业的三级监管体制。淡马锡是一家以市场化方式运营的政府投资公司，而淡马锡模式的核心在于政府、国资运作平台、企业的三层架构，政府控制国有资本，但不直接管理企业，三层架构给企业空间、给政府控制力，同时在微观运作中尊重

市场规律。

事实上，我国对淡马锡模式的讨论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早在 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将“发展混合所有制”和“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定位国企改革的重头戏。对于发展混合所有制，市场比较统一的观点是借鉴和学习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

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现阶段国企改革怎样使用淡马锡模式还需试验，淡马锡模式的三大重点是政企分开、盈利驱动和董事会制度，而在中国国企改革将遵循中国国情与特色，同样的模式，有着不同的落脚点。

本轮国企改革中，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实现从资产管理到资本管理一直是被反复强调的核心重点之一。与其它改革方向相比，由“管资产”到“管资本”无疑是最有可能给国有企业带来真正变化的改革方式，也是淡马锡模式的基础。

改组国资投资公司、运营公司是淡马锡模式在中国的具体应用方式。2014 年 7 月 15 日，国资委就宣布了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开展改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试点。这些试点正在试图理顺中国下一步国资国企改革中避不开的难题，比如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与国资委之间的

关系如何确定等一些中国国情特有的问题。也是中国国资国企改革必须啃下来的硬骨头。

可以肯定，淡马锡模式确实是一种很实用的国资国企改革方式，但其基础则是政企分开。离开这个前提，淡马锡模式同样不能成功。然后才能有盈利驱动和董事会制度，而这两点的关键层面：一是它依靠产权纽带管理国有企业；二是完全市场化，不搞特殊化，这两点都是以政企分开为基础。

应当说，只有实实在在的市场化，产权才能够成为确定的事情，混改的国企才能获得社会资本的参与热情。建立在产权之上的委托—代理链条，

才会促使国企董事会和管理层进入各自的角色，而不是董事长像官员，总经理像董事长。国企董事会才能具有选聘和任命经营层的权力，董事会才不能继续当摆设。

改革原本就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套用。其实，成立政府投资公司不难，甚至依葫芦画瓢地学习淡马锡的治理结构也不难，难在模式的有效性上。这并不是模式本身存在问题，而是忽略个体差异，解决掉个体差异问题，才是中国国企改革的真问题，也只有这样，改革才能取得成功。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胡说一道】  
“百万富翁效应”并非中国股民所专美，其实，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 股市的“百万富翁效应”

胡不归

炒股票，对于一般人来说，似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个事儿涉及的面儿太广了，并不是简单的一句“低买高卖”就能解决问题的，但对于很多股民，却完全可以将其简化——看看大佬们买了哪些股票，跟着买就是了。

譬如，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信息：马化腾买了什么什么股票，史玉柱增持了什么什么股票，马云、丁磊、雷军又在如何布局 A 股……别小看这些信息，这些大佬们往往都是股民眼中的风向标，很多股民就是因为这些大佬们买了，才跟着去买的。这背后的逻辑很简单：1. 大佬们都是亿万富翁吧；2. 大佬们之所以有钱，一定是善于投资的；3. 推及股市，大佬们买的股票肯定没错。那么，跟着买就是了，哪还用费心费力地去研究政策、研究公司、研究国内外经济形势啊？

我原来以为只有中国的股民才喜欢这样跟风，最近重温了一遍老电影《百万英镑》，才发现“百万富翁效应”并非中国股民所专美，其实，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百万英镑》出自马克·吐温的一篇讽刺小说《一张百万英镑的钞票》，由于有了格里高利·派克的出演，它比起原著毫不逊色，成为喜剧电影的一部经典之作。它讲述的是一位美国流浪汉亨利亚当，流落到伦敦，因为一对英国富翁兄弟富极无聊打的一个赌，而遭遇到的种种奇遇，令人捧腹。其中的一段故事挺有意思，容我慢慢道来。

手中握有一张百万英镑钞票的亚当，在伦敦遇到了一位金矿老板霍斯顿。后者正为公司现金流出了问题一筹莫展，遇到亚当，如获至宝，当即和他攀上了交情，并以亚当的名义在股市上买入两万股自己的公司——好希望金矿的股票。消息传开来，好希望的

股票疯了。无论是富豪名流，还是平头百姓，都对其趋之若鹜。很快的，霍斯顿的问题迎刃而解，正当也凭空多了 15000 英镑的股票资产（那个年代的 15000 英镑可不是个小数目），皆大欢喜。

可节外生枝的是，一向看不起美国暴发户，并因为亚当的入住而被赶出酒店豪华套间的英国老公爵，耿耿于怀之余，搞了个恶作剧：让酒店女侍把亚当的那张钞票给藏了起来，并四处放风说那美国小子就是个骗子，根本没有百万英镑的钞票。满城风雨之际，当地报纸记者上门求证，亚当果然拿不出钞票。这下可炸了。服装店老板、酒店老板等一帮人开始向亚当催账。亚当无奈之下，说：好，你们等着吧，别以为我除了那张钞票就没钱了。他的信心源于他手上还有价值 15000 英镑的好希望公司股票。可他没想到的是，等到了证券交易所一看，好希望

早就跌得一钱不值了，他还被交易大厅内的交易员们给抬着扔了出去。

更可怕的是，等亚当回到酒店，发现酒店大堂挤满了来找他算账的股民们。股民们找他算账的理由是：你是个假百万富翁，那么你投资的金矿也就是假的；我们是因为你才买了好希望，现在亏了，不找你找谁？万般无奈之下，亚当在酒店大堂发表了一篇演说，在我看来，这篇演说可以称得上是投资圭臬：

——那个矿里有金子，是个好项目。这与我不是百万富翁有什么关系呢？

——你们不要抛出股票，而是要继续买，拯救你们的是你们自己！

可是，股民们显然不买账，他们纠结的依然是：你到底是不是百万富翁？激愤之下，甚至有股民开始拳脚相加。危急时刻，感觉玩笑开大了的老公爵挺身而出，说明了事实真相。于是，亚

当立刻变回了好人，好希望也立马又成了好公司，人们争先恐后地赶回交易所抢购股票去了。

这个故事，与迷信大佬投资动向的中国股民，何其相似乃尔。

从作者的交代来看，好希望金矿确实是个好项目。可股民们看上的，却不是企业的基本面（用霍斯顿的话说，有了亚当的名字，那个金矿里有没有金子已经不重要了）。他们在意的是，买了好希望股票的亚当，究竟是不是百万富翁。如果是，那么好希望肯定没问题，反之，好希望就是一个骗局。这种投资方法，多么简单易行啊。

从这个角度来看，马云马化腾们是富翁，显然没有任何问题，那么，他们投资的股票，自然也能带来丰厚的回报。这就是人们的投资逻辑，也是媒体对大佬们的投资动向津津乐道的主要原因吧。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经济钩沉】  
明清两代，京城周围的寺观与太监之间的关系几乎都剪不断理还乱。

## 太监如何养老

王国华

曾经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当年的太监并非终身制，他们退休之后怎么办，谁来给他们养老？

显然，不能老死在皇宫。虽然他们一辈子伺候皇室成员，但皇室没义务给他们养老，这就是主子与奴才的区别。到了最后奴才还得自己找辙。

明清资料显示，太监老迈以后，很少衣锦还乡的。族人不愿意接受一个身体残缺的人，祖坟尤其不能，那些有血缘关系的人平时没少跟着太监沾光，但在这种“大是大非”问题上还是很讲原则的。太监也不愿自讨没趣，他们找到了一个适合颐养天年的地

方——寺庙、道观。清人裴景瀚在《游大悲寺记》中记载：“环(北京)城四野，往往有佛寺，宏阔壮丽奇伟，不可胜计。询之，皆阉人之葬地也。”

寺观也有花销，当然不会平白无故收留太监。二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太监们从年轻时开始和寺庙建立密切的经济联系。他们一般是加入自发组织的“养老义会”，清末太监张修德等在《太监与寺院》中讲述，“入会的太监要先交百八十块钱，三年后便可以到养老义会所属的寺庙养老，吃住不用花钱。”其实这就相当于缴养老金，整存零取；还有的通过关系在寺观中拜个师父，挂个和尚、道士的名，定期存钱。退休以后名正言顺搬到

寺观里住，直到死去。这是中下层太监最常用的办法。

稍微有点钱的，不愿受制于人，就自创寺观。史载，明英宗宠爱的司礼太监王振“作大第皇城东，建智化寺，穷极土木”。这可以视作对未来的一种投资。可惜王振没等到自己享用，便在土木堡之变中丧命；“万历初，大瑞冯保营墓地，造寺曰双林。双林，冯之别字也。”在冯保之后，“张太监宏，继冯掌印，宏墓在阜成门外迎祥寺侧。”谁出钱建造，寺观的所有权就归谁。将来回归社会，这就是现成的不动产。

这种形式的寺观，除了自己养老，还可以救助同僚。乾隆年间，乾清宫督领侍刘钰、副侍萧云鹏等人倡立“万寿

兴隆寺养老义会”，在北京南郊置地二百一十亩，以租金供养老迈无依的太监。清末太监信修明在遗著《老太监的回忆》中也称，“余创立思济慈保古会于此（即万寿兴隆寺），救济失业太监。”

所以，明清两代，京城周围的寺观与太监之间的关系几乎都剪不断理还乱。一座寺观里面，从投资人到普通员工，处处离不开太监。因为心怀极大的不安全感，他们对佛道的信仰也许比普通出家人更坚定。

有人也许会说，只要攒了足够多的钱，完全可以回家雇人养老，想雇什么样的雇什么样的，何必投资寺观？其实不然。寺观能给予太监的，除了吃喝

用度，还有存在感。在这里可以与各类人打交道，以免与社会脱节。最重要的是，如重病卧床，寺观里的师徒、师兄弟关系可以让卧床者享受到家庭一般的照料。如果雇人照料，见你无法行动，把你的东西卷跑你都追不上。

到了慈禧时代，备受宠信的大太监刘诚印创了个记录，他拜白云观方丈刘宗玄为师，先后捐募白银 2.1 万多两，成为全真道第 23 代传人，在白云观传戒三次，受戒者达 1100 人，不少太监都受了戒。本是迫不得已的养老行为，竟能玩成一代宗师，要说跟慈禧的支持没关系，打死我也不信。有权者通吃，自古皆然啊。

(作者系深圳作家)

## 将核安全锁定在法治轨道

刘武俊

根据媒体近日报道，作为核电领域的顶层法律，《核安全法》已经确定于明年年中送交全国人大讨论。其中，保证公众参与核电站规划和审批被写入《核安全法》。这意味着，核安全法将保护公众话语权，“公众意见决定核电站去留”将入《核安全法》，公众不同意，核电站肯定不会建。

中国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成员国，已是世界上核电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但政府在监管核安全方面的基本法律却长期缺位。国际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有《原子能法》、《核安全法》和类似于《核安全法》的法律。在 1984 年开始起草的《原子能法》，至今处于开始的尴尬境地。目前，我国核能安全监管依靠的是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以及 8 部行政法规和一些部门规章，这与我国核能大

国的地位颇不相称，也难以应对我国核安全的严峻局面。

目前中国与核相关的法律法规较为全面，但是至今缺少一部顶层大法，而将在 2016 年推出的《核安全法》将担当此重任。2013 年，《核安全法》正式进入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2014 年，在《核安全法》立法过程中，国家核安全局提出了涉核领域法规体系顶层设计方案。《核安全法》也可以在相关领域弥补我国核安全法律制度空白，如核事故损害赔偿、核安全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等。

核安全涉及铀矿资源的勘探和开采、整个核燃料循环、放射性废物处置、放射性物质运输、核技术应用、市场准入、事故应急、核损害赔偿、法律责任等多方面，目前有关核安全的法规规章无法涵盖上述方面且层级偏低，亟待以原子能法的形式明确核安全监管的主体、程序及责任，核安全事

故的信息公开等等，将核安全纳入法治的轨道。

建议在原子能立法尤其是核安全立法中，参照国际通行法则，明确一个利益相对超脱、地位相对独立的权威机构（如国家核安全局）专门进行核安全监管，彻底解决多头管理、职能交叉的老问题。就核安全监管现状而言，和食品安全监管一样存在多头管理的扯皮问题。仅以有关放射性的许可登记举例，目前对核设施安全的许可由隶属于环保部的国家核安全局审管，对放射工作的许可则仍按照《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放射防护条例》的规定由卫生、公安部门审管，对贮存、处置放射性固体废物的许可则由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管。一旦发生核污染事件，这种多头管理的体制就容易出现相互推诿难以问责的情况。

建议核安全立法中，重点落实核

安全监管机构的法律责任，解决核安全监管机构法律责任空白问题。核安全立法既要规定核设施营运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更要落实核安全监管机构的法律责任。只有依法明确核安全监管机构的法律责任，才有可能将核安全监管的责任落到实处，真正体现“责任重于泰山”的分量。

建议核安全立法明确要求核安全事件事故不论大小一律第一时间通过媒体向公众公布，充分满足公众对核安全的知情权，如有隐瞒将依法追究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的法律责任。我国现行核安全事件事故的公开机制尚不完善，亟待通过核安全法依法确立和规范，将政府信息公开原则真正落到实处。

“公众意见决定核电站去留”有望写入《核安全法》，彰显了核安全立法保护公众话语权的。核安全建设需要扩

大公众参与，公众参与的内容主要包括，核电站环评和安全评价要公示征求大家意见，邀请新建核电站所在地的官员和相关人士参观已经建好的核电站，以及加大公共网络宣传，而这些以前是忽视的。8 月 7 日是首届“全国核行业公众开放日”，我国 16 个在运、在建核电基地揭开神秘的面纱，向公众展示安全、清洁、高效的内涵。更有实际意义的是，公众的意见将决定核电站去留，公众如普遍不同意，核电站肯定不会逆民意而建的。

在核安全形势严峻的背景下，必须高度重视核安全立法。期望核安全立法也能像核电建设一样进入快车道，尽快出台，将核安全锁定在《核安全法》的法治轨道，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的核安全法律和监管体系，真正树立践行核安全国家责任的大国形象。

(作者系司法部《中国司法》杂志总编、研究员)



【说法不武】  
期望核安全立法也能像核电建设一样进入快车道，尽快出台。